

楚辭注釋

《楚辞研究集成》

主 编：马茂元

本册主编：马茂元

编 撰：杨金鼎

王从仁 刘德重

殷光熹



楚辭研究集成
楚辭注釋
馬茂元 等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經書書店湖北發行所發行
咸寧地區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開本 19.875印張 460,000字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數：1—7,800

統一書號：10106·908 定價：(平)5.25元
(精)6.35元

總序

公元前三世紀，繼《詩經》而出現的《楚辭》，把我國詩歌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；標志着由羣衆文學進入作家創作的時代。《楚辭》奠基者偉大詩人屈原，成爲我國文學之父、詞章家百世不祧之宗。它不僅如劉勰所云：“叙情怨，則鬱伊而易感；述離居，則愴怛而難懷；論山水，則循聲而得貌；言節候，則披文而見時”，驚采絕艷，在藝術上達到高度完美的境地。更重要的是，《楚辭》裏所表現的屈原追求光明、抗擊黑暗、堅持真理、熱愛祖國，鍥而不舍的獻身精神，千百年來，一直鼓舞着人們前進。許多志士仁人從中吸取力量，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，它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。近世以來，屈原被列入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之林，成爲中華民族的驕傲；《楚辭》進入世界文學寶庫，成爲全人類的精神財富。

“漢武好《騷》，淮南作《傳》。”自從劉安對屈原代表作《離騷》的思想意義及其藝術特色進行深入的探索，作出精當論述以來，二千多年中，歷代學者對屈原及《楚

辭》的研究蔚然成風，延綿不絕，在學術領域中自成體系，構成一項專門之學。有關這方面的專著見于著錄者，現存二百種以上，至于單篇散論見于各書者，更是數量繁多，難以統紀。隨着國際文化交流的日益發展，海外研究屈原及《楚辭》的專家也不乏其人，可惜的是絕大部分尚未譯成漢文；對於多數人來說，尚存在着文字的隔閡。

歷史是割不斷的。任何研究工作都有它的繼承性、連續性。前人步武的終極，應該是後繼者發軔的起點。這樣才能推動這門科學不斷向前發展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清理、吸收和參考前人以及近代學者的學術成果，去粗取精，從而使自己更進一步向新的目標邁進，對於研究工作者，是十分重要的。建國以來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，屈原和《楚辭》的研究，通過有關紀念活動，曾經掀起高潮，並取得可喜的成績。然而，無可諱言，在大量的著作和論文中，敷湊成篇，並無真知灼見者，也往往有之。其重要原因之一，是沒有很好地利用有關文獻資料。師心臆測，游說無根，就必然流于掠影浮光，而不可能進行深入的探討。

目前，我國正處在發揚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、建設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偉大歷史時期，對屈原及《楚辭》的研究，自應在過去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有所提高，有所突破，開創一個新局面。然而對一般有志于

《楚辭》研究的同志來說，文獻資料的困難，仍然是未能解決的問題。這不僅是由于對散見雜出的資料，還沒有進行清理，即使是有關《楚辭》的專著，除了近年來出版的幾種而外，許多權威性的注本，如汪瑗的《楚辭集解》、戴震的《屈原賦校正》等，要想求得一部，也非易事；至于歷代和近時以及國外的研究情況，更是缺乏歷史的、全面的了解。為給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提供線索，并幫助一般文學愛好者通過閱讀欣賞《楚辭》原作，進入研究領域，湖北人民出版社約請我們編撰這部《楚辭研究集成》。內容共分以下五個部分：

第一編：《楚辭注釋》

注釋的篇目是：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所輯楚人的作品，即屈原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問》、《九章》、《遠遊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漁父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（一曰景差作）；宋玉《九辯》。注釋的範圍主要包括掃除語言障礙，闡述作品意義與作家思想，分析篇章結構和其他藝術手法。

本書持論力求公允。對歷史上有影響的說法，擇要予以并存，并提出作者的看法。一般情況下，擇善而從，以一說為主。

第二編：《楚辭要籍解題》

擇選歷代學術價值較高、影響較大的《楚辭》專著，寫出提要。選目方面，注意詳今略古和有裨實用。主要內容為作者生平、成書經過、基本內容、學術評價、版

刻與館藏情况等。

附：《楚辭專著目錄》

收錄歷代《楚辭》研究專書，注明書名、卷數、作者、版本、館藏諸項。

第三編：《楚辭評論資料選》

收錄五四運動以前的《楚辭》專著和文人別集、讀書札記、詩話、詞話等書中有關楚辭評論的資料，分以下七類編排：一、屈原、楚辭和屈賦總論，二、離騷，三、九歌，四、天問，五、九章，六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和二招，七、宋玉。

第四編：《楚辭研究論文選》

選取近、現代較有影響的《楚辭》研究論文，分類編排；門類同第三編。

附：《楚辭研究論文目錄索引》

第五編：《楚辭資料海外編》

此編選譯海外研究楚辭的專著和論文，按內容分類。每篇文章之後，附譯後記，簡介作者情況、本文的內容及其學術價值。爲了使讀者對世界各國研究《楚辭》情況有較全面的了解，譯者還就上述問題撰有概況綜述；最後附以《國外楚辭研究論著目錄索引》，以備查閱。

本書由馬茂元任總主編兼第一編分冊主編，洪湛侯任第二編分冊主編，楊金鼎任第三、四兩編分冊主編，

尹錫康、周發祥任第五編分冊主編，王從仁協助總主編
審閱、修訂全稿。

馬 茂 元

目 録

目 録

離騷.....	(1)
九歌.....	(107)
天問.....	(193)
九章.....	(295)
遠游.....	(421)
卜居.....	(463)
漁父.....	(477)
招魂.....	(485)
大招.....	(533)
九辯.....	(573)

離 騷

劉德重 注釋

劉德重 解題、說明

《離騷》是屈原的代表作。全篇共三百七十多句，二千四百多字，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。

關於《離騷》篇名的涵義，古今各家說法不一。最早的解釋見於司馬遷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引淮南王劉安《離騷傳》中的話：“‘離騷’者，猶‘離憂’也。”但這話說得不太明確，很容易使人把“離”和“騷”分開來理解，以為是兩個詞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說：“此於‘騷’古音與‘憂’同部得之。”可見“騷”、“憂”當為古音同部通轉，所謂“離騷”即“離憂”，也當是一個完整的意義。後人大都誤會了這句話的原意，以致分訓“離騷”二字，引出許多歧義來。首先是班固，他在《離騷贊序》中說：“‘離’，猶遭也。‘騷’，憂也。明已遭憂作辭也。”這是訓“離”為“罹”，從而得出“遭”的意思，“離憂”便成了“遭憂”。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即從此說。其次是王逸，他在《楚辭章句》中說：“‘離’，別也。‘騷’，愁也。”這是把“離”解作“離別”，“愁”從“憂”字而來，“離憂”於是成了“別愁”。汪瑗《楚辭集解》、閔齊華《文選淪注》、屈復《楚辭新注》均從此說。又，項安世《項氏家說》云：“《楚語》伍舉曰：德義不行，則邇者騷離，而遠者距違。韋昭注曰：‘騷’，愁也。‘離’，畔也。蓋楚人之語，自古如此。屈原

《離騷》，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。其後詞人仿之，作《畔牢愁》，蓋如此矣。‘畔’謂散去，非必叛亂也。”他注意到《國語·楚語》中的“騷離”、揚雄仿作的《畔牢愁》，認爲出自楚地方言，這是很有見地的。但囿於韋昭的注釋，仍然分訓“離騷”二字，說成是“以離畔爲愁”，還是未能得出正確的結論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從此說，但說得較爲圓活一些。此外，還有一些說法，如李陳玉《楚辭箋註》云：“‘騷’乃文章之名。若‘離’之爲解，有隔離、別離、與時乖離三義。”其實，“騷”作爲一種文體，原是得名於《離騷》；說《離騷》的“騷”即爲“文章之名”，可謂本末倒置。同時，他又根據《離騷》中的三句話，把“離”的三種意義牽合在一起，更加不得要領。再如戴震的《屈原賦注》云：“‘離’，猶隔也。‘騷’者，動擾有聲之謂。”訓“離”爲“隔”，本自李說。釋“騷”爲“動擾有聲”，則由顏師古《漢書·賈誼傳注》“擾動曰‘騷’”而來。凡此種種，看來都是由於不明“離騷”二字的詞性所致。直到近人游國恩，才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。他指出：《離騷》這一名稱具有雙重涵義。從音樂方面來說，《離騷》“乃是楚國當時一種曲名”。“《楚辭·大招》有‘伏羲《駕辯》，楚《勞商》’只之文，王逸注云：‘《駕辯》、《勞商》，皆曲名也。’“‘勞商’與‘離騷’爲雙聲字，古音勞在‘宵’部，商在‘陽’部，離在‘歌’部，騷在‘幽’部，‘宵’‘歌’‘陽’‘幽’，並以旁紐通轉，故‘勞’即‘離’，‘商’即‘騷’，然則‘勞商’與‘離騷’原來是一物而異名罷了。”從意義方面來說，“‘離騷’二字可能又有牢騷不平的意思”。“《漢書·揚雄傳》載雄旁《惜誦》以下至《懷沙》一卷，名曰《畔牢愁》。‘牢愁’古疊韻字，同在‘幽’部；韋昭訓爲‘牢騷’。後人常語謂發泄不平的氣爲‘發牢騷’，蓋本於此。‘牢愁’、

‘牢騷’與‘離騷’，古並以雙聲疊韻通轉；然則‘離騷’者，殆有不平的義。”（引文分別見《楚辭概論》、《楚辭論文集》）按，游氏的這一論證是正確的。屈原的創作，從楚國的民間文學汲取了豐富的養料，既然其作品的内容“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”（黃伯思《翼騷序》），那麼，作品的名稱襲用民間歌曲的舊題，自然是極有可能的。而這一名稱的本身，又並非有聲無義。除了游氏所說“離騷”、“勞商”與“牢愁”、“牢騷”分別為雙聲或疊韻的聯綿詞外，劉安、司馬遷所說的“離憂”也是雙聲聯綿詞，“憂”在“幽”部，也可以與“騷”通轉。它們實際上都是一聲之轉的同義詞，同是表示一種抑鬱不平的感情。而《離騷》所抒發的正是這樣一種感情。可見作品的標題取決於作品的内容，標題的音樂意義與作品的内容是統一的。

關於《離騷》的篇名，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說明。一是把《離騷》稱之為“經”的問題。在《楚辭章句》中，本篇題作《離騷經》。王逸解釋“經”字說：“經，徑也。……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。”這顯然是牽強附會。宋代洪興祖在《楚辭補注》中指出：“古人引《離騷》，未有言‘經’者，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，尊之為‘經’耳。”可見“經”字當係後人所加，是尊之為“經典”的意思。王逸竟以為原來就有“經”字，又曲為解說，以致錯上加錯。一是把《離騷》用作泛稱的問題。這也始於王逸。他在《楚辭章句》中，把凡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概題為《離騷》，凡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題為《續離騷》。如《九歌》題作《離騷·九歌》，《九辯》題作《續離騷·九辯》。這樣，《離騷》就有了廣狹二義：狹義是指本篇，廣義是泛指屈原的作品。後人更進一步用“騷”來概括全部《楚辭》。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以《辨騷》名篇；蕭統的《文選》單列“騷”

類；屈原的作品以及後來的仿作，都被稱為“騷體”，等等。這些稱呼，雖然相沿成習，其實並不合邏輯。一是把《離騷》稱之為“賦”的問題。這是由於漢朝人對“辭”、“賦”的概念混淆不清所造成的。司馬遷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中有“乃作《懷沙》之賦”的說法，又說：“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‘辭’而以‘賦’見稱。”這裏所說的“賦”，實際上指的是“楚辭”。後來班固在《漢書·賈誼傳》中更稱：“屈原，楚賢臣也；被讒放逐，作《離騷賦》。”他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還明標“《屈原賦》二十五篇”。實際上，“賦”到漢朝才成為文學的一種體制。由於“漢賦”是從“楚辭”演化而來的，漢朝人只看到它們的同，沒有區分它們的異，所以在他 的眼光中，屈原的作品無一不屬於“賦”的範疇。直到今天，不少人仍習慣地稱屈原的作品為“屈原賦”或“屈賦”。從嚴格的意義上說，這種稱呼也是不恰當的。

關於《離騷》的寫作年代，舊說多以為作於懷王朝屈原被疏（或被放）以後，但未說明具體時間。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《史記》的《楚世家》、《屈原列傳》、《六國年表》和劉向《新序》等記載，定為懷王十六年左右。近古及現代學者，據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和其他資料，又提出了種種解釋：陸侃如《屈原評傳》以為作於懷王十三年，在“造為憲令”，遭讒去職之後。姜亮夫《屈原賦校注》認為始於懷王十六年，成於頃襄王初年。游國恩《楚辭概論》推為頃襄王三年或三年後。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則認為作於自沉之年，即頃襄王二十一年。我們認為，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關於《離騷》的一大段文字放在上官大夫奪稿、“王怒而疏屈平”之後，並不等於說《離騷》的寫作就是這一年的事，而只是說明，《離騷》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。至於究竟是哪一年，早在二千年前的司馬遷

已經感到文獻不足的困難，因而沒有作出明確的判斷；但在他的提示下，通過對作品深入的研究和探討，還是可以作出合乎情理的推論的。《離騷》既然是一篇抒情詩，而它的具體內容又帶有自敘生平的性質，則作品本身對有關客觀事件的敘述和個人遭遇因由的揭示，情感上所發抒的憂憤之深廣，創作上所表現的氣魄之雄偉，這一切無不透露了它產生的時期，既不可能是少時，也不至於是晚年，最適合的便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時期。篇中關於年齡的敘述，處處都證實了這點。試把篇首“恐美人之遲暮”，篇中“老冉冉其將至兮”，篇末“及年歲之未晏兮，時亦其猶未央”等句綜合起來，互相印證，便不難得出一個整體的理解：假如是三十以下的青年人，無論怎樣多愁善感，也不會說出這樣老聲老氣的話；但要把它作為五十以上的老年人的語氣，也不妥貼，因為那就談不上“時亦其猶未央”了。如果再要說得具體一些，那麼，以三十九歲至四十一歲之間，亦即楚懷王二十八年（前301）至三十年（前299）之間，最有可能（關於屈原的生卒年，各家推算不一，詳見本篇第一段注③；這裏對屈原年齡的計算，從浦江清說）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先看這以前的情況：懷王十八年，屈原諫阻釋張儀；二十年，齊楚復交；二十四年，楚又背齊合秦；二十五年，秦楚盟於黃棘；二十六年，齊、韓、魏共伐楚，秦遣客卿救楚，三國引兵去；二十七年，楚太子殺秦大夫逃歸，秦楚始絕交（參見本篇第二段注④）。可見在這十年中，楚懷王雖然主意不定，但一般地說，楚國的情況還算是比較穩定的。而尋繹《離騷》的語氣和感情，不免大聲疾呼，痛哭流涕，說明楚國的危機已全部呈露，不象是這十年間危機還處於潛伏狀態的樣子。再看這以後的情況：懷王三十年即被騙入秦，從此一去不返。《史記》記懷王之死，一再說“楚人憐之”，“楚人皆憐之，如悲親戚”；

以屈原與懷王的關係之深，他當時的心情，更可想見。然而，《離騷》裏對此却只字未提；相反，篇中倒有“哲王又不寤”的話，與懷王入秦後能抵制要挾、有悔悟表現不合。這樣看來，有可能寫作《離騷》的時間，就只剩下秦楚絕交之後、懷王入秦之前這三年了。這三年，正是楚國最危急的一段時期。從二十八年起，秦、齊、韓、魏三面夾攻，楚國屢次兵敗地削，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。這時，屈原又正好四十上下，處於思想成熟、生命力旺盛的階段。他在不斷的、劇烈的政治鬥爭中，眼看祖國的命運一步步地發展到這般田地，於是以不可抑制的悲憤心情，爆發出象長江大河一般雄偉的詩篇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不論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，還是從作者的年齡特征看，《離騷》作於這一時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關於《離騷》的創作緣由和抒情主題，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說：“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陷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《離騷》。”又說：“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《離騷》，蓋自怨生也。”還指出：屈原“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復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”聯係上述關於《離騷》寫作的時代背景來看，顯而易見，屈原的“疾”、“怨”和“憂愁幽思”，是與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係在一起的。《離騷》就是屈原根據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遭遇，“發憤以抒情”而創作的一篇政治抒情詩。其中曲折而又盡情地抒寫了自己的身世境遇、思想感情、理想抱負，展現了一個具有崇高人格和鮮明個性的詩人形象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《離騷》也可以看作是詩人的自敘傳。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^①朕皇考曰伯庸。^②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^③

皇覽揆余于初度兮，^④肇錫余以嘉名；^⑤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^⑥

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^⑦又重之以修能。^⑧扈江離與辟芷兮，^⑨紉秋蘭以爲佩。^⑩

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^⑪朝搴阰之木蘭兮，^⑫夕攬洲之宿莽。^⑬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^⑭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^⑮

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^⑯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！^⑰

①高陽：古帝顓頊（zhuān xū 專須）的稱號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索隱引宋衷云：“顓頊，名；高陽，有天下號也。”據王應麟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引《郡縣志》，高陽原係地名，故城在汴州雍丘縣（今河南杞縣）西南二十九里，顓頊因輔佐少昊（hào 浩）有功，受封於此，因號高陽氏。又據《史記·楚世家》：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。高陽者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也。”王逸《楚辭章句》（以下略去書名，簡稱“王逸注”或“王逸云”，所引各家仿此）：“《帝繫》曰：顓頊娶於騰陸氏女而生老僮，是爲楚先。其後熊繹事周成王，封爲楚子，居於丹陽。周幽王時生若敖，奄征南海，北至江漢。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，周不與，遂僭號稱王，始都於郢（yīng 影）。是時生子瑕，受屈爲客卿，因以爲氏。”則顓頊爲楚之先祖，也是屈原的先祖。屈原本屈瑕之後，屈瑕是楚武王熊通（一作達）之子，因受封於屈地，遂以屈爲氏。所以追本溯源，屈原與楚王同姓。

共祖，都是高陽氏的後裔。苗裔(yì義)：指遠末的後代子孫。朱熹《楚辭集注》：“苗裔，遠孫也。苗者，草之莖葉，根所生也。裔者，衣裾之末，衣之余也。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。”

②朕(zhèn振)：第一人稱代詞，猶言我。古代貴賤通用，秦以後成爲帝王自稱的專用詞。《文選》呂延濟注：“屈原自稱也。古人質，與君同稱朕。”皇考：對死去的父親的美稱。

“皇”是光大的意思王逸注：“皇，美也。父死稱考。”《禮記》：“(祭)父曰皇考，母曰皇妣。”按，“皇考”亦可指曾祖（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、陳直《楚辭拾遺》）或遠祖（見王闓運《楚辭釋》、聞一多《離騷解詁》），但聯係下文“皇覽”句，此處當以指父親爲是。伯庸：屈原父親的表字，其名與生平事迹已不可考。王逸注：“伯庸，字也。”也有人以爲是名或化名。開頭二句，屈原自述世系，言出身貴胄，與楚同宗共祖。張德純《離騷節解》云：“首溯與楚同源共本，世爲宗臣，便有不能傳舍其國、行路其君之意。”馬其昶《屈賦微》云：“同姓之臣，義無可去，死國之志，已定於此。”可參。

③攝提：有二說。一說是“攝提格”的簡稱，亦即寅年的別名。王逸注引《爾雅》：“太歲在寅曰攝提格。”李巡注《爾雅》此句云：“言萬物承陽而起，故曰攝提格。格，起也。”戰國秦漢時以歲星紀年，劃周天黃道爲十二等分，用恒星斗、牛、女、虛等二十八宿定位，名星紀、玄枵(xiāo消)、顓臾(jū zī居資)、降婁、大梁、實沈、鶉(chūn純)首、鶉火、鶉尾、壽星、大火、析木十二宮，又以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、子、丑十二支與之相應，歲星一年移一宮，移入斗、牛之間的星紀宮時稱太歲在寅，該年即寅年，亦稱攝提格。一說是星名。朱熹注：“攝提，星名，隨斗柄以指十